

导 论

改革—民族复兴的必然选择

当我们满怀崇敬与自豪，慢慢翻卷开中华 5000 年文明史的时候，不难发现，中华民族的文明跃迁之路有着太多的磨难和险阻。

正如黑格尔所说的那样，人类文明的太阳曾经从东方升起。历史上的中国，以其高度发达的文化、科技和经济在农业文明时代一度无比的兴盛，长时间走在世界文明发展的前列。然而，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崛起，中国却开始了“无可奈何花落去”的衰弱，成了一个落伍者。

5000 年日换星移，那曾经升起的太阳终又陨落。

随之，对于东方的未来，对于中华民族的未来便有了种种猜测：

黑格尔告诉人们：人类社会发展的太阳已不会再次从东方升起，东方不可能再度辉煌。

拿破仑，这位叱咤欧洲、睥睨天下的法兰西皇帝则认为：中国是正在酣睡的雄狮，一旦醒来就会震动世界。

恩格斯在 1857 年宣告古老中国末日到来的同时，却又热情地预言：过不了多少年，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帝国的重新崛起，同时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

人类历史发展的经验证明：历史的倒退往往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惨痛失败激活了中国文明，生活于

这个时代的中国人担负起了重新开天辟地的使命，担负起了结束 5000 年过去，开创光明未来的重任。

于是，1840 年以来，一代代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民族的复兴、国家的繁荣和社会的进步进行了曲折探索和艰难选择，谱写了一曲曲悲壮异常、响遏行云的中华正气歌。如果说在 20 世纪中叶，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为民族振兴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奠定了决定性的基础，那么，到 20 世纪末，中国共产党人在此基础上终于找到了走出低谷，摆脱落后，重新攀上人类文明顶峰的现实道路——社会主义改革之路。

今天，任何不怀偏见的人都会看到，从 1978 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已使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如 1995 年江泽民在为新加坡总统王鼎昌举行的国宴上发表的讲话中所说的那样：改革开放使“中国大陆的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人民生活明显改善，政治稳定、社会进步、民族团结”。的确，改革使中华民族焕发出无限生机和活力，并以其不竭的智慧和非凡的创造力，书写了人类历史在 20 世纪最后也是最辉煌的一页，创造出了震惊世界的“中国奇迹”。

在 21 世纪的朦胧晨曦之中，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能够真切地听到中国——这位东方巨人迈开大步，向着经济发达、国力强盛的目标奋进的空谷足音。

被拿破仑称为东方睡狮的中国在社会主义改革的推动下醒来了，凭海临风，仰天长啸。

人类社会发展的太阳再次从世界的东方喷薄而出。恩格斯的预言实现了。黑格尔的预言破产了。

20 年改革实践证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选择的改革之路，是中国社会由落后状态向发达状态转变的有效途径和正确道路，是切合国情的现代化之路，是民族复兴之路。

改革是相对于革命而言的，而改革与革命又是共生于人类历

史发展过程中的一对范畴，是人类社会发展和变革的两种基本形式。正是在二者彼消此长、依存共进的演化中，才产生了支配历史发展的伟力。如果没有社会革命与改革的矛盾运动，人类社会的步履就要停滞。当然，二者的区别也非常明显，从社会历史发展过程来看，社会革命只存在于阶级和国家这段历史长河内，而改革则存在于人类社会始终。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之前，革命始终是牵引中国社会发展和进步的火车头。正是在这绵延不绝的革命中，生产力不断得到解放，推动中国社会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跃迁。

然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直接动力来自革命还是改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困扰着中国共产党人。我们曾一度沉迷于社会政治革命，指望以阶级斗争为杠杆推动社会主义的发展。结果却出现了持续的动荡、混乱和倒退，距振兴中华的目标越来越远。实践证明，片面的革命论只会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损失和危害。在社会主义社会，社会基本矛盾不再具有强烈对抗性质，它不需要通过阶级斗争来解决，只要通过改革，直接推动作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实现形式的经济体制及其他各方面体制的变革，就能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因此，在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后，社会主义发展的直接动力，是社会主义改革。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吸取了以往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后，理清了革命与改革的辩证关系，深刻地揭示了它们各自的理论内涵和历史作用，明确提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改革是解决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根本途径和唯一可能的方法。从而在理论上找到了以改革作为社会主义发展直接动力的科学依据。

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情况来看，也只有不断改革，才

会有社会主义的蓬勃发展，才会有国家的繁荣和民族复兴。

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仿效苏联建立起了高度集权的经济和政治体制。随着社会生产规模越来越大、经济活动越来越复杂、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其弊端便越来越多地显现出来。如经济上，所有制形式和结构过于单一；忽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分配中搞平均主义。政治上党政不分、政企不分，官僚主义严重等等。这都使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失去活力，束缚、限制以至破坏生产力发展。因此，现实也要求我们必须对旧体制不断进行改革和完善，建立充满活力和效能的新体制。

在对传统体制运行状况进行批判性分析后，邓小平得出结论：不改革就没有出路。如果现在不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于是，在 20 世纪末，中国共产党人获得了这样一个共识：改革是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的必由之路，是民族振兴的必由之路。

当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作出这一抉择后，古老的华夏大地上涌起的改革大潮如滔滔黄河水，奔腾而下，不可阻挡，中国社会在这场大潮的荡涤下焕发出勃勃生机。

迄今为止，这场始于 1978 年的中国改革已整整走过 20 年的风雨历程。20 年来，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经济体制改革到政治体制改革，从对内搞活到对外开放，从思想解放到理论创新……改革大潮已波及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在这场深刻的历史性变革中产生了惊人的跃迁和变化，使世人看到了中华民族复兴的曙光。

改革开放使我们国家的中心任务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促进了经济实力的增强，推动了综合国力的壮大，使中国成为亚太地区经济增长最快、经济动力最

强、经济潜能最大、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新的增长极。随着经济高速增长，中国经济规模不断扩大，成为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大国，所有这些都为中华民族在 21 世纪的腾飞准备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20 年改革开放历史成果的积累，使中国社会运行机制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开始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转化。

改革开放使当代中国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转化。中国这一东方文明古国，在饱尝了闭关锁国之苦后，终于推开了尘封的窗门，以开放的姿态，去延揽八面来风。

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催生了无产阶级治国安邦的伟大理论——邓小平理论，这是中国 20 年改革的重大理论成就。这一理论深刻地揭示了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科学地解答了新时期中国的发展及如何发展的全局性、长远性、根本性问题，指明了中国发展的道路、方向、目标、任务、动力、步骤和条件，为实现第二次革命发挥了巨大的指导和推动作用，成为推动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物质力量。

20 年，对于中国这个拥有 5000 年文明史的东方古国来说，只是她沧桑巨变中的一瞬，但这短短 20 个春秋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影响却是惊人的，是中华民族史上的重要历史时期，是中国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少数几个政通人和、人民休养生息的最好历史时期，是中华民族走出低谷、走向复兴的伟大转折时期。中国正随着改革开放大潮，扬帆远航，走向世界，走向富强、民主、文明，去完成一个人类文明史上由盛变衰、再由衰至盛的奇迹。

至此，经过近代以来百余年的痛苦反思和自我批判，中国人民终于在 20 世纪的最后 20 余年里，找到了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

善和自我创新之路，找到了民族复兴之路，这是民族之大幸，是人民之大幸。如果说中国人民是在民族复兴之路的迷失状态中走进 20 世纪的，那么，经过一个世纪的探寻，尤其经过世纪末的改革实践，中国人民正踏着一清晰的、正确的发展道路，昂首走出 20 世纪，走向未来，走向中华民族的新辉煌。



理
论
篇

一 伟大的旗帜

翻开 20 世纪的历史长卷，可以发现，最辉煌的篇章是在世纪末由中国人书写的。中国在经历了 20 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奇迹，实现了民族命运在 20 世纪的转折和巨变。

如今，在世界经济舞台上，中国已成为一支重要力量。

我国的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 6 万亿元人民币，跃居世界第 7 位，居发展中国家第一；

我国的年进出口贸易额接近 3000 亿美元，截止到 1997 年，在世界贸易排位中连续 5 年保持第 11 位；

我国的钢产量突破 1 亿吨，居世界第一位。

我国外汇储备、引进外资数量等诸多方面都居世界排行榜前列。

伟大的成就缘于伟大旗帜的指引，这面旗帜就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郑重提出作为全党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的邓小平理论，它是中华民族崛起的思想基础，民族振兴的精神动力，民族腾飞的思维之翼……

中华民族从未中止过理论思维。纵观中华民族 5000 年文明史，每一时代、每一时期，都产生过充满睿智和理性的思想体系，引导先民们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明与制度文明。但是，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很少有理论像邓小平理论一样，对民族的振兴、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综合国力的增强，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

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旗帜，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中诞生的思想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人最可珍贵的精神财富。

20 年的改革开放催生了邓小平理论，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20 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邓小平理论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难以分开的。因此，不了解邓小平理论就不可能真正了解当代中国，就不可能真正了解 20 年的改革开放。

（一）历史考察：邓小平理论的形成

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时代背景与历史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说：“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①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内容也是这样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是一定历史时代需要的产物，并且是以中国过去的整个历史发展，以中国社会和中国现代化的特点，以当今世界的时代特征，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种种成果为基础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纵观人类思想发展史也可以发现，凡是科学理论，都不是凭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44页。

空产生的，都有其产生的理论基础和实践依据，以及特定的历史根据和时代背景。

邓小平理论也不例外。

首先，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一个时代的世界潮流，对该时代的各个民族来说，都是发展振兴自己，进而走在世界历史前列的最大机遇和条件，同时也是最大的挑战和考验。邓小平理论，正是立足于中国国情，把握和顺应当代世界历史潮流的理论，是对当代世界最大的机遇与挑战在总体上和战略上回应的理论。

中国在当代世界面临的机遇与挑战，首先是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带来的。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时代的主题就开始逐步由战争和革命向和平与发展转换，但冷战还长期存在，中国周边的局部战争连绵不断。直到 70 年代以前，和平与发展这个时代主题，至少在中国人眼里还未凸现，还没有对时代主题的转变作出反应。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我们党敏锐地把握住了时代的主题。“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①这是邓小平对和平与发展主题的科学揭示，也是对当代世界历史发展潮流的准确把握。

邓小平敏锐地把握住了这一中国现代化起飞的重大历史机遇和条件，并且站在世界的高度，把中国的发展置于世界发展的大格局中来考虑，从总体上和战略上回应当代世界最大的机遇和挑战，确立了当代中国的主题：和平建设。在系统回答“如何发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05 页。

展”这一问题的同时，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论体系。

可以看出，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的确立，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时代背景。

其次，邓小平理论是在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产生的。

人类文明的任何理论的产生，从认识史的角度看，都要从既有的思想资料出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之所以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中逐步形成邓小平理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以毛泽东思想为基础的。在我们党对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早期探索中，形成的一些理论观点，为邓小平理论提供了许多理论生长点。毛泽东提出的中国工业化道路是邓小平中国式的现代化理论的生长点；八大制定的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为主、个体经营为补充，计划生产为主、自由生产为补充的方针，是公有制为主体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生长点；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分析，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可分为发达社会主义和不发达社会主义的论断，关于 50 年左右到 100 年左右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论断，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生长点。如此等等。总之，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正确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发展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若干重要的，但还不清晰、没有展开的认识，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系统化的理论。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邓小平理论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产生的。

伟大的理论来自伟大的实践。前人提供的理论生长点不管多么重要，如果没有新的实践，也不可能生长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理论和新观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走自己的路，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建设道路，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新路子，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1979年以来，改革开放使我国生产力获得新的解放和巨大发展，整个国家焕发出勃勃生机。这一崭新的实践，是人民群众生气勃勃的伟大创造，是党的理论发展的源泉。邓小平始终站在时代潮流的前面，支持和引导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实践，总结群众的成功经验，把经验上升为理论，作为新的理论概括。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邓小平理论的实践依据。

总之，在改革开放这一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中，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中国又面向世界，总结历史经验又正视现实，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国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发展新思想，形成了邓小平理论。

酝酿萌芽

我们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可追溯到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前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对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提出许多熠熠闪光的思想。邓小平作为党的总书记、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直接参与了这一历史性探索，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和思想，这就是后来邓小平理论的最初酝酿和萌芽。

1956年前后，邓小平对“中国式工业化道路”提出了自己的理解。他在党的八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以及进入社会主义初期的一系列重要讲话、谈话中，就已经提出了关于共产主义原则要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观点；关于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建设一定要面对国家现实和群众需要的观点，等等。显然，这些思想观点同以后形成的建设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

如果说，1956年、1957年邓小平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想，是中央领导集体的共同思想的话，那么，60年代初，邓小平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问题上，事实上已经形成了许多符合中国实际的重要思想观点。例如，1962年在恢复发展农业的问题上，他主张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做法。面对当时农村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的讨论和争论，邓小平提出：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喜欢哪种形式就采用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他说：“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①这里蕴含着实事求是和生产力标准思想，表现出邓小平的创新精神和求实态度。

1975年，在党和国家被“四人帮”搞得一团糟的情况下，经周恩来等推荐，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此间，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他积极贯彻毛泽东的指示，通过治理整顿，使整个社会尽快地由大乱走向大治；同时，邓小平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进行了构思，提出了一系列的重要观点和思想。如，一再重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提出把经济建设作为党和国家的大局，要求全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生产力正名，把是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作为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和真假社会主义的根本标准，等等。应该说，这个时期邓小平领导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全面整顿，以及围绕这一整顿展开的斗争，为以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23页。

后粉碎“四人帮”、否定“两个凡是”，为党的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转移，做了一定准备。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说到改革，其实在 1974 到 1975 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①可以说，“全面整顿”的指导思想同当时“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是相对立的。因此，“全面整顿”可以看作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先声。

总的来说，50 年代末、60 年代初以及 70 年代初，邓小平关于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属于酝酿和萌芽阶段，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

形成主题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完整意义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得以展开。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在不断加深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基础上，从理论上开始找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并初步形成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其中，从 1978 年 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到 1982 年党的十二大，是邓小平理论开始形成主题的时期。

这一时期，邓小平除了确立起“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战略布局，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战略构想外，在 1979 年 3 月党的理论务虚会上，最先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论断。他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

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①这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早表述。

1979年9月，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国庆30周年讲话，提出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第一次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从而使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内容更加丰富。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根据邓小平在此之前多次讲话中所阐述的原则，系统地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概括为10条，较全面地阐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总路线的关系作了初步的理论说明，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勾画了一个初步的轮廓。

1982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科学概念：“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②同时，十二大第一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必须具有的一个重要特征，全面、科学地阐述了精神文明的内涵和巨大能动作用，以及与物质文明建设的辩证统一关系，第一次提出“两步走”的发展战略。十二大报告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容的多方面论述，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而开始形成邓小平理论的主题。

^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3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

形 成 轮 廓

实践是理论长河涌动不息的源头。任何理论只有不断接受实践的锻打和考验，才能获得发展并走向成熟。

“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这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对中国共产党人的要求。的确，失去了勇于探索的精神，泯灭了理论创新的勇气，中国共产党不仅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无所作为，而且在理论上也只能囿于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而裹足不前。因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这一伟大实践中，面对层出不穷的种种新情况、新问题，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思考与探索。

事实上，改革开放的实践每深入一步，总是出现对传统社会主义观的挑战，对理论创新活动提出新的要求，而伴随着对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的把握和解决，总是带来理论认识上的巨大飞跃和发展。

从党的十二大到 1987 年 10 月党的十三大，在我国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展开的基础上，邓小平理论初具轮廓。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在 1984 年 10 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在这一被邓小平称作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的文件中，比较系统地总结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阐述了经济体制改革中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它在理论上的突出贡献就是，开始突破把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观点，为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新模式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也是后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前导。

1986 年 9 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社会主义